■读与评

走龙舞马:动态的金色丝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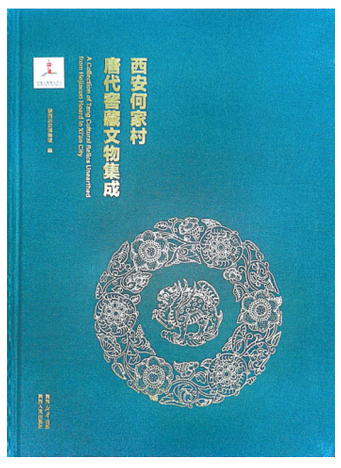
——读《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

王子今

西安何家村1970年10月以金银器为主的珍贵文物的发现,学界曾称“何家村窖藏”“何家村遗宝”,因遗物数量巨大、种类齐全、纹饰精美、工艺高超、内涵丰富,声名远播,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侯宁彬:《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序一)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就何家村的重要发现,一直没有编辑出版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现在,参照考古发掘报告体例,完整收录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何家村窖藏文物959件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终于出版,补足了以往的缺憾,而以后的研究会更上一个台阶(齐东方、侯宁彬:《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序二)的学术前景,也因此得到了实现的条件。

何家村遗存,当时被有意深埋在地下。土层千百年的封压,却并没有杀灭这些基于饱满艺术热情和蓬勃美学追求而创造的旷世珍宝的文化活力。金走龙,共12件,“因系手工打制,金龙身姿和步态都略有不同”,双脚及四肢与躯体用“焊接”方式连接。角与头部颈部的组合,扬抑倾向也各自“不同”。与步履的对应,都表现出富有生命力的动态。著名的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形制表现出和草原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银壶上的舞马形象为今人再现了早已失传的唐代宫廷舞马祝寿娱乐活动的场景”。壶底与圈足间的“焊接”痕迹以及“焊料脱落”情形,也值得研究者注意。这些文物精品华美的艺术特质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表现了鲁迅曾经赞美的一个时代“魄力究竟雄大”的“豁达闳大之风”。在后来的历史时期,这种文化风格“消歇净尽了”。鲁迅是在欣赏一面“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的古镜时发表这样的议论的。他认为这是汉代的镜子。“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鲁迅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豁达闳大之风”的表现,多见于经由丝绸之路的“通”“致”“取”“来”。

丝绸之路的考察、理解与说明,是现今社会共同关注的文化主题,也是许多研究者看作主攻方向的学术任务。确如谭前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所说,何家村发现不仅反映了大唐王朝的艺术水平、科技成就和社会风貌,也多有外来文化的精品,从来源上看,既有来自域外的舶来品,也有唐人的仿制品;既有中央官府作坊的产品,也有地方的进贡品。全面反映了大唐文化的世界性和唐人的开放精神,对于研究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的手工业工匠在制作时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萨珊等中亚和西亚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造型和纹饰,还使唐代的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何家村遗存中,我们看到直接来自域外的文物,如属于中亚粟特产品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来自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凸圈纹玻璃碗,具有典型波斯风格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水晶八曲长杯等。而更多物品造型与纹饰体现中西合璧的特点。如狩猎纹高足银杯,其造型源于东罗马。摩羯纹金杯可见印度文化的影响,其装饰方式又具有西亚文化的特点。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体现出典型的粟特金银器风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唐代金银器、玉器,系统、完整地反映出外来文化的取用、模仿、融合进而改造、创新的过程,是唐代乐观开放、积极进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物化的体现,从物质文明的角度再一次证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放眼看世界、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时期。”(申秦雁:《重见天日的遗宝》,《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版)经过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介绍,人们普遍认识到,汉唐丝绸之路促成了文化联系与文化传播。然而具体说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仍然是具有学术前沿意义的新课题。而考古发现所获信息的保护、整理、研究与再发现,往往可以促成全新的学术认识的获得。《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出版,发表了新的资料,提示了新的判断,增益了新的知识,也启示我们进行新的思考。



谭前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其实并非简单的平面性的“综述”,而是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一定研究水准的学术总结。对于这批文物有总体的分析研究,而相关研究论著均予收集消化,学术概说大致到位,发表评议基本得体。有些认识的提出,充实了我们的知识。比如关于“秘密埋藏”以“保存金银”的方式,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引《因话录》载范阳卢仲元得金百两,密埋于居室内;《朝野佥载》说长安人邹骆驼发现伏砖下瓷瓮有金数斗;《旧唐书·王稷传》云“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这些故事,都有助于说明何家村窖藏文物发现的缘由。论者指出:“可知埋藏金银财宝的做法在唐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其他器类最大区别是,它们主要发现于‘窖藏’。‘窖藏’是指文献中屡屡见到的有意埋藏珍宝的遗迹。”《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采用了这一意见,指出:“(唐代金银器)绝大多数都出自窖藏或居住遗址,只有极少部分出自墓葬。”唐代“埋藏金银财宝”故事后一例王稷的“复垣”,汉代称“复壁”,或用以藏身。更早则有孔壁中书的保存方式。而唐代富家用以珍藏金银,体现出社会文化史的时代特点。

对于何家村发现的“银香囊”,齐东方进行过细致的研究。通过“何家村银香囊”与“沙坡村银香囊”“三兆村银香囊”“法门寺银香囊”“正仓院银香囊”“弗利尔银香囊”“凯波银香囊”“大都会银香囊”共13种“唐代银香囊”的相互比较,提出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齐东方指出:“这种器物在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两件,记载地宫藏品的《法门寺物账》上记述银器时提到‘香囊二枚重十五两三分’,与出土器物正合。可知这种圆形的熏香器物的名字应是‘香囊’。”关于其“十分别致”的形制,指出“使用时,随着最内层半圆形香盂所受重力和活动机环的作用,无论外层球体如何转动,最里面的香盂总保持平衡状态。香盂盛装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出,设计非常巧妙。”(《唐代金银器研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也采用“香囊”的名号,还在“了解唐代科技文明的实物资料”一节高度评价了这一器物的“科技”品质:“在设计上运用了常平架原理(陀螺仪原理),无论怎样转动香囊,其内的焚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状态,根本不用担心火星或香灰外溢。这种在欧美近代才用于航海和航空的常平架原理,中国早在唐代便已掌握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足以反映唐代在金属制造工艺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其实,《西京杂记》卷一“被中香炉”条已经写到:“长安巧工丁缓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发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这种机械结构的设计和制作,当在“唐代”以前很久,应当注意“房风”“丁缓”的早期发明。《西京杂记》的这条材料,其实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已经引录。至于“香囊”定名,似应当说明通常形制为织品制作的“香袋”。由曹操高陵出土“香囊卅双”石牌,可以推知应有日常使用的“香囊”随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也可见“香囊”铭文,可以看作相类同的文化现象。汉魏的“香囊”,应不同于何家村所见有学者称之为“香炉”的器物。东汉魏晋时期社会上层用“香”风习普及。贵族大墓或大量随葬“四方珍香”。对西域出产“香”的热情追求,也是丝绸之路史所见社会文化迹象。

走笔至此,还想就何家村“金走龙”再说几句话。编者告诉我们,金走龙“现存6条,另6条被盗,至今尚未破案”。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话题,却经常没有办法避开。拙著《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曾经讨论历代盗墓史迹,提示中国法制传统对盗墓行为的严惩。可惜,人们在面对科技水准、社会产能、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的现代进步时,却往往看到背离文明史发展的历史意识和道德品格的倒退。

回到“何家村”主题,我们在这里还是应该衷心祝贺《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面世,真诚感谢本书编写者和出版者出于学术责任意识的辛勤付出。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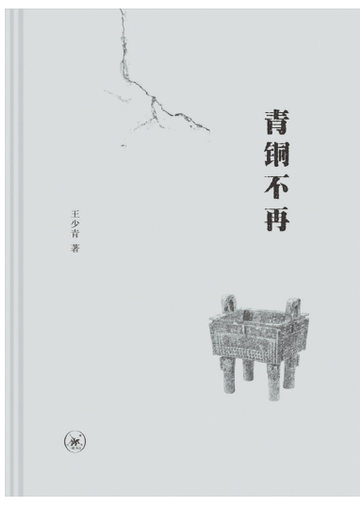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
主编:侯宁彬
执行主编:谭前学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心灵深处的弦歌

——评王少青的文博随笔集《青铜不再》

张俊梅

王少青先生是一位千余万人口大市的宣传工作者,更是一位文化学者。日前他把三联书店再版的《青铜不再》文博随笔集寄给我,展读之后发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其中的部分文章曾在《中国文物报》“文博随笔”栏目发表。《青铜不再》选入的文章,大多围绕作者生活和工作的中原历史文化遗迹展开,涉及有关的文化典籍、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并以此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著名文博专家谢辰生先生曾于2014年12月为本书作序,称作者有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识见,“反映出作者深厚的文化积累和融会贯通的能力”。读完《青铜不再》,感受到作者对文博工作和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及作为文化学者的现实关怀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



作者借着对历史的观照审思人生,叩问人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又常常将眼光聚焦于中原历史遗存的保护和利用。在《修陵修风与修心》中,作者通过追溯天下第一陵——河南淮阳“太昊陵”的历史变迁,从中发掘中华民族敬畏历史、“尊圣贤,重教化”的精神传统。结合当下出现的问题,如不计后果的商业开发,致使历史文化遗存在“保护”“弘扬”的幌子下被损毁。他希望历史文化遗存在科学保护的同时,“把这些项目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很好地呈现出来”,把文化遗存的精神提炼出来。《阳春面与乱炖》这篇文章,作者信笔从平粮台古城遗址写来,谈到文化遗址如何准确定位、科学保护和利用。针对遗址类文化遗存保护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有效保护遗址文化的“原味”,警惕急功近利,避免表面化,以防止文化遗址“营养成分”的流失。

人文与历史的研究重在求真。近年来,一些地方出于商业开发动机,对早有历史公论的名人出生地借故争论和炒作,甚至“不惜搅浑历史”来获取商业利益。对于这种现象,作者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和求真求实的精神,列举了“老子故里”“李白故里”等无端之争,呼吁人们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以科学的态度,“消除无端之争,面向世界负责任地展示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谈到文化经典的研究,作者也秉持求真的科学态度。《陈风的失忆》,作者通过考察从汉代《毛诗序》到宋代朱熹对《诗经》注解,揭示了由于政治伦理的需要,千百年间,使《诗经》这部富有生命力而又极具审美特质的诗集沦为教化的工具。作者敏锐发现封建政治伦理及其意识形态对作为主体的学者的异化,认为《诗经》中的一些作品被“怀有各种目的和水准参差的学者政客拿来反复研究”,结果诗歌作品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质朴、清新的诗味,被注解得了无痕迹”。作者继而提出,当下历史文化和经典作品研究要以此为鉴,回归历史真实回归经典本身,拒斥“有选择的捕捉,有目的的解读”。

浓郁的人文意识是《青铜不再》的突出特色。何谓人文,在作者看来就是超越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地理、经济等一切文化形态,把握以文为质、以人为本的内核,以个体的精神境界,汇聚成社会的向上风尚。基于此,作者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展现一个学者的不凡见识。《青铜不再》这篇随笔,作者通过考察淮阳出土的楚顷襄王陪葬的陶鼎,分析战国后期楚王朝的兴衰与沉沦,通过梳理楚国都城的历史细节,总结出此时的楚国虽有“积极进取的斗志和姿态”,但在不可更改的时局和无法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下,终将沉没。《深处弦歌》,作者通过分析孔子一生求道而不被理解的命运,发掘孔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及“欲行大道于天下,百折不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江湖夜雨十年灯》,写汉武帝时期淮阳太守汲黯深陷复杂矛盾与政治旋涡,但坚守造福于民的初衷,奉行黄老之学,指出“他在痛苦中挣扎,在挣扎中选择”的生命状态,展现出一种强大的为道殉身的人格力量。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诗人,他的一生怀才不遇自有公论,但作者在《怀才的遇与不遇》一文中,不从政治得失论成败,而是以文化成就论英雄,认为曹植的“不遇感”是自我认知错位造成的,本质上把政治权位看得高于文学;曹植流芳千古,不在权位得失,而在于文学成就,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观照,这恰恰是“遇”。作者继而认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传统文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认同和思维定式,希望凭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得到权利和名望,扭曲了心性和才华。作者的这种发现直指问题症结,既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又是对现实中“官本位”问题的深刻洞悉。河南省扶沟县的大程书院是一道文化风景,此书院为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创办。作者在《终是过客》一文中,通过发掘有关人物掌故、历史材料,以及对现有文化遗存的考究,进而剖析皇权统治对学者思想的奴役,指出程氏兄弟扬名立身的理学,其功能不过是构建统治者意志的社会秩序——“如果说人民群众是一群羔羊,二程理学终于给统治者找到了牧羊的鞭子。”作者继而追问,倘若随着历史的进步,“羔羊站出了主人翁的姿态,鞭子又有谁再去扬起?”

对现实问题的殷殷关切也是《青铜不再》的思想特色,不仅体现出一个人文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出一个人文学者的独立思考和社会批判精神。作者拒斥“为学”的功利化和学者的“被工具化”。他认为,当下一些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名利所诱惑,“有意无意地放弃了社会批判的责任,扮演了技巧化与工具化的社会角色”,他担心长此下去一旦成为风气,就如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智慧出,有大伪”。这样,一个社会就会出现看似文化繁荣,实则人文疲软的现实,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功能已经丧失。在城市化浪潮的滚滚洪流冲击之下,如何传承文化传统、如何科学地保护和利用人文遗存,作者有自己的思考和洞见。《让城市的灵魂更有趣》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个性,个性可以千差万别,而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灵魂至关重要,文化灵魂之于城市是一种标杆、一种精神所在。城市的灵魂是由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起来的,是城市蕴含的最深层、最顽强、最活跃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气象。他提出,“文化的根本,是要塑造人格和灵魂。”而今天的城市建设应该顾及不同城市的历史传统和人文遗存,并加以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这样让一座城市的灵魂和精神变得更有趣、更健康、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

《青铜不再》文字有限,但我想王少青先生关于文博工作的思考不仅仅是这本书中所呈现的这些。多年来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坚持读书,坚持思考,沉下心来写作;疏离浮躁喧嚣繁琐俗务,以清醒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品格,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人文历史的探究。这种生活习惯和生命状态实在难能可贵。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王少青先生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坚守,在心灵深处已筑起了高高的“弦歌台”,而《青铜不再》中的文字就是他的“歌声”,这“歌声”呼应着大时代,不仅传达了他对历史人文的深切感悟,同时也传达出一个人文学者心灵深处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最真实的热爱。

《青铜不再》
作者:王少青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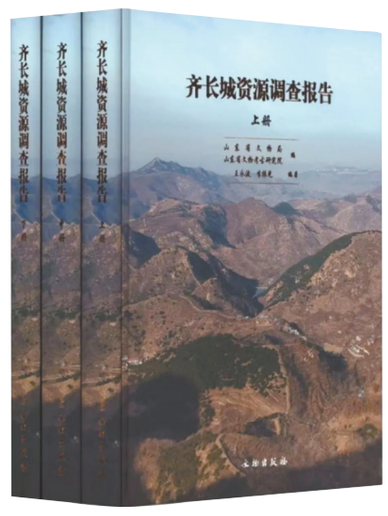
“长城之父”齐鲁脊梁

——读《齐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王海东

近期,山东省文物局等单位编写的《齐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刊行,可谓长城保护史上的一件要事,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者、研究者乃至广大长城爱好者而言值得奔走相贺。

齐长城,山东古代一项伟大的边防工程,中国历史上修筑最早的长城,距今已有2600余年历史。其西起古济水东畔,东到黄海之滨,途径18县(市、区),跨越1500余座大小山峦,横亘齐鲁,逶迤而行,绵延千里。齐长城不仅对春秋战国时期燕、赵、魏、楚、秦等列国长城的构筑提供了先导实例,也为后世历朝历代长城之修建确立了范本,被称作“长城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与守望和平的重要标志,那么齐长城则是齐鲁文化的代表,是岱海之地的精神脊梁。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齐长城已成为不朽的传奇,凝聚了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齐长城见证了列国争霸的历史风云。齐长城是春秋战国大争之世的产物,与齐国国运相始终,见证了先秦诸侯的争霸称雄、合纵连横,承载了两千余年的刀光剑影、铁马金戈,绘就了山东大地丰富的历史底色。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互相攻伐。齐国在参与争霸过程中,为免除大军远征的后顾之忧,防备晋、鲁、楚等国的侵犯,在西、南边境修筑长城,后经过数百年的增筑和修补,终成规模,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和齐国国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元前484年,吴鲁联军在艾陵大败齐国,全歼十万齐军,吴军乘胜追击,最终止步于坚固的齐长城脚下,面对溃逃的齐军无可奈何。《左传》“(晋鲁之师)会于鲁济,寻洮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清华简》“齐人始为长城于济”、《鄗羌编钟铭》“唯廿又再祀,鄗羌作戎,厥辟韩宗徹,率征秦迮,齐人长城,先会于平阴”、《史记·赵世家》“七年,侵齐,至长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遂起兵,西击赵卫……赵人归我长城”等文献记载,表明终春秋战国之世,齐长城乃是列国征战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齐长城蕴藏着先秦兵家的思想精华。齐地先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遵从《孙子兵法·行军篇》“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的原则,充分利用断崖、陡峰等险要的自然条件,在边境地区“依山为纲”构筑起大型、连续的线形防御工程,显示齐人在军事领域的禀赋和造诣。齐长城在平原地区多以夯土墙为主,在丘陵地带多为土、砂、石混筑墙,在山地区域则多以干摆石墙为主,将《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齐长城以延绵不绝、高大厚实的城墙为线,构成难以逾越的防御阵地;以坚固的关隘、堡垒为点,造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态势,达到以最少兵力延缓大规模入侵的防御效果;以散布的烽燧、兵营为面,快速传达敌情、准确调配后续兵力。以上这些无不闪耀着先秦兵家军事思想的光辉。呈“人”字形布局的齐山地长城与济水岸防,连接渤、黄,构成了完整闭合的军事防御体系,使齐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四塞之国”。

齐长城守望着齐鲁之地的文脉传承。齐风泱泱、鲁韵汤汤,齐、鲁是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两个最重要的诸侯国。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革新,鲁文化尊传统。二者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有机的整体、现代山东的名片。《管子》云:“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可以说,齐长城是齐、鲁两国的分水岭,同时也是齐、鲁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和门户。平阴要塞、长城铺、锦阳关、黄石关、穆陵关、西峰关,这些齐长城上的关隘连接着齐鲁两地,沟通了双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孔子适齐,向齐景公阐述儒家君臣之义;齐桓公开设稷下学宫,成为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而发生在齐长城地带的夹谷会盟,王道与霸道抗衡,弱国与强国交锋,则是齐鲁文化的一次直接碰撞。孟子、荀子、墨子、孙武、孙膑、淳于髡、邹衍等诸子先哲都曾驻足齐长城脚下,思考人生哲理,谋绘治国大道。齐长城,见证了齐鲁文化的融合和华夏文明的盛放。

齐长城承载了千年不变的家国情怀。“孟姜女哭长城”这一家喻户晓的传说,原型乃是春秋齐庄公时期“杞梁妻哭夫”的故事,而被“哭倒”正是齐长城,非秦长城。杞梁英勇杀敌、为国捐躯,孟姜哭夫斥君、感天动地,经过两千多年来的演变和经久不息的传诵,长久地存留在当时及后代的记忆中,赋予了齐长城忠君爱国、追求家国永安的精神内涵。历史的车轮前进到现代,齐长城沿线又成为抗日游击战的重要战场。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长城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觉醒,齐长城所在的大峰山地区被开辟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地军民配合八路军115师将大峰山建设成“泰西小延安”,共筑山东地区的抗日长城,对日军给予沉重的打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号召力。1942年,在齐长城重要隘口——马鞍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战斗,八路军战士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山东版“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传遍全国。一场场浴血奋战,为古老的齐长城注入了当代爱国主义的基因。齐长城所承载的坚韧不屈的家国情怀在齐鲁大地上回荡。

秦统一之后漫长岁月里,齐长城除部分建筑承担过一定的军事功能,大部分墙体基本湮没于历史的长河,逐渐演变成遗址形态。为响应国家文物局号召,加强对齐长城的保护,山东省有关方面根据《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要求,对齐长城资源的分布、结构特征、走向、长度、保护现状、修建年代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信息采集,基本摸清了齐长城资源的家底,确认了城墙的走向、长度、构筑方法、用材,以及关隘、寨堡、烽燧和沿线相关遗迹的基本情况。此外,本次调查还有两个重要成果:一是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比对齐长城西端起点附近夯土的特征,结合《清华简》等文献记载,考证出齐长城始建于齐桓公时期;二是发现青石关堡及青石关长城的构筑风格和齐长城有明显的差异,但与章丘锦阳关段清代重修的长城极为相似,通过梳理民国地方志等文献,明确青石关长城乃是咸丰年间当地官民为了防御捻军而自发修筑。此次调查为有史以来,对齐长城进行的一次有计划、有方案、最科学、最全面、最详尽的实地调查,为《齐长城总体保护规划》《齐长城分段保护方案》编制,以及长城保护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齐长城是中国长城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宏大的文物古迹之一。诚如编者所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保护意识的加强和技术的进步,包括齐长城在内的长城遗迹必将得到持久地保护和传承,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更新、更好的作用。

《齐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编著:王永波 李振光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